

口述歷史

· 翟永華 ·

美國陸軍第二十航空隊救難組 陳柳亭老師

如今六十多年過去了，有很多抗日戰爭中英勇士實不爲人所知，由於許多緣故，使他們被歷史的塵煙遮蓋了，而沒有被記錄在抗戰史上，使他們成了「無名英雄」。現在，我們有機會透過口述歷史，讓大家記住這些默默無聞的英雄。

我的父親陳榮恩是個很有名望的醫生，母親王玉梅是位護士，早年兩人因爲一起工作，相戀而結婚。我有四個兄弟，我排行老二，只有大哥及老四繼承了父親的專業也成爲醫生。我是民國六年出生於浙江杭州，今年也已九十四歲了。（編按：陳柳亭老師今年九十五歲）



陳柳亭老師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父親加入中國紅十字會，率領七個醫生及志工一起派往歐洲，在法國及德國從事作戰期間中國兵傷亡照護之工作，當時德、法兩國將國內的中國工人也送上戰場，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犧牲不少無辜的中國人。回國後，先父先後創辦很多的教會醫院。

我的伯父是教會所創辦的杭州「之江學院」醫學系第一名畢業，梅騰根先生創辦了廣濟醫院時，我的伯父是副院長。

我是杭州天臺人，浙江臺州府臨海縣的望天臺醫院是我父親的醫院，溫州的歐海醫院亦是我父親所創設，他在此醫院擔任兩年的院長，可惜因操勞過度，年紀才三十四歲就因得了肺病而過世了。

因出生於醫學世家，也因為我比較聰明，所以小時候父親指定我一定要學醫，哥哥很老實又大方，花費較大，在父親的眼中並不適合做醫生。可惜父親去世的太早，所以除了我之外，反而哥哥和弟弟兩人都投入學醫方面之工作。

我大概五歲時，與哥哥（九歲）兩人都是穿著西服、短褲上學校，家境十分的好。小學時我在臺州府的臨海縣讀「敬愛小學」，中學在寧波「三一中學」，是基督教學校，高中在「嘉興中學」，也是一所教會的學校。這些教會學校從小學三年級就開始學英文，所以我的英文程度一直都很好。

高中畢業後，我對農業方面比較有興趣，希望將來以農爲我的主業，因此就到農業推廣所學習農業方面的課程，

所以畢業後就在靈隱寺對面的「西湖農場」擔任技佐的工作。後因農場的廠長及女秘書都離職，我接下了代理廠長之職務。

正逢抗戰開始，杭州城內開始遭受日機的轟炸，國難當頭，實無心於農場工作，想從軍報國。因此我到浙江和江西交界處金華縣，那時陸軍官校第十六期正在辦理招考，有步兵科、砲兵科、騎兵科……等兵科，在當時大約有上萬多人前往報名。

原來我所報考的是留俄的機械化兵團，報名的資格必須爲大學畢業以上的程度，我有資格可報考。因爲受完陸軍訓練，就要派到蘇聯去讀大學進修，考試相當嚴格。在我們那地區，此兵科一共才錄取三十餘名同學。離家從軍時我帶了二十幾塊錢，我的母親又給了我一只八分六錢重的金戒子，作爲備用，此戒子我從未想到出售，留作紀念。

我們入伍後，就從浙江搭火車到江西的鷹潭，鷹潭是一個很鄉下又很窮苦的地方，從這以後開始行軍。到達湖南時，當地的老百姓對軍校學生都很照顧，把門板都拆下來以供學生們休息睡覺。走到武漢，就走了兩、三個月。之後我因故未與部隊同行。而由同學陳正詔的叔父安排我們坐船到了重慶。到重慶時正好趕上了日本大轟炸，我們在躲轟炸時一連兩次在防空洞遇上了一同躲警報的林森先生，他老人家留著很長的鬍子，看起來很威嚴，看我們穿著軍服，得知我們爲軍校學生後，賞給我們一人五塊大洋作爲獎勵，加上口袋中還有十幾塊大洋，足供我們再搭汽車直接到西安第七分校。等其他同學一路行軍至西安軍校，才知在此期間，路上太苦了。要機械化兵科這三十幾位大學生每天行軍數十公里路，到湖北已吃不消，要走到陝西路程有數千里，實在太遠了，因

此有幾位同學體力不勝負荷，病逝於路上，真是太可憐。

後來才知道我們的領隊是騙我們的，說我們是留俄學生，將來要成立一個機械化兵團，結果我們被分派至砲兵科。得知此消息讓我大哭了一場，原本我在農場擔任代理廠長的工作做得很好，因想要留俄才報名參加，誰知卻是當一名砲兵。希望落空使我萬分的難過，但也無其他的辦法。

我們全體在西安陸軍官校第七分校集合，校長為胡宗南將軍，第七分校有六個總隊，一個總隊有一千多人。我們砲兵隊大概有一百一十六人，在牛東村訓練，十五期的砲一隊和十六期的砲二隊都在此訓練。十五期的砲一隊的學生程度也很高，有一半以上的學生都是南開大學的畢業生。

出操是辛苦的，但還是可以忍耐，但校區寢室的情況之糟，至今還是難以想像，一個人睡覺就是三塊磚的寬度，全擠在一起，睡在稻



留美時的學生照

草鋪的地面，上面蓋草蓆，冬天發兩條棉被，但棉被及棉襖內的跳蚤、蟲子可以一把一把的抓下來，尤其是肩膀關節處最多，卻一點辦法也沒有。冬天我們到河邊洗澡，脫下了棉襖用冰來擦身體，冷也要洗，不洗全身就癢得難受，最享受的就是在太陽下脫下棉襖抓蟲子，這樣苦的日子我也度過了。我有一個軍醫少將的叔叔，看我穿這一身破爛軍裝，幫我做了一套全新的制服，我不敢穿，以免標新立異，只好掛在床頂上的板牆上，直到畢業。

兩年訓練之後，身掛武裝帶，腰配軍人魂短劍，以陸軍少尉軍官身分畢業。還未分發部隊，此時空軍到牛東村王曲第七分校總部來招考空軍官校學生。飛行是我的夢想，可是當時我們那裡並未招考空軍，這個機會自然不能放過，很多人前往報考。首先嚴格的體檢就使我們大多數的人被淘汰，最後我們砲科方面，包括我一共六人考取空軍官校第十四期生，現只剩下了我和楊國光同學兩人。

第三批留美學生有十二、十三、十四期，共三期學生，我也是第三批留美學生。經印度搭乘皇后號郵輪來美時，在航程中，我和夏功權兩人英文比較好，在船上經常找美國女孩談天、看電影，一點都不寂寞，夏功權是一個很用功的學生，口袋中放有一本字典，隨時見到不懂的字就馬上翻閱字典，在我們之中，他的英文屬於佼佼者，也常在同學與美教官之間擔任翻譯的工作。來到美國接受訓練，一共分三階段，初、中、高級，每一階段都有學生被淘汰，我是在雷鳥飛初

級飛行，也是第二個放單飛的學生。畢業考試時，上級派了教官來隊上測試學生，我在做「懶8字」飛行時因太有信心，反而沒有飛好，沒有第二次的機會，一下了飛機，馬上就宣布停飛，因此才改學偵察科。當天被停飛的共有七個人，我是第一個十四期被淘汰的學生，十三期有五個人，十二期有一位。施之溥也是十四期生，他是第四批留美，那時還未到美國，他是在馬拉納(Marana)中級飛行學校時被淘汰後也轉學偵察。

決定學偵察科後，我們七人就前往丹佛，丹佛大學在美國是一所很高的學府，之後又進了耶魯大學，有三個月的時間學習照像、洗相片方面的工作，住在同一間寢室。我還在耶魯



偵察學校同學上：馮紹齡、下：劉鴻業、左：陳柳亭、右：萬光恆。

大學教中文兩個星期，最後我是偵察學校畢業，施之溥也是偵察學校畢業，比我晚了一屆。

偵察學校是位在德州，美國與墨西哥交界的一處訓練基地，那是一個美軍的「OTD戰術訓練」射擊靶場，飛行及偵察都在同一地點，我們使用的是O-51型偵察高級教練機，也配有機槍，所以我們也有空對地的射擊訓練，同時還練習在一輛大巴士上，使用機槍地對空打靶的射擊訓練，我們前後一共訓練了近一年半才畢業。我們比第三批留美學生早一點畢業，搭乘美國「自由輪」，一艘大約可搭乘兩百人，一共有三艘「自由輪」一起出發至印度，再搭運輸機經駝峰返回國內。我們雖然是十四期生，但在空軍官校學生名冊中找不到名字，主要是因為上面只有飛行科學生的名冊，我們十四期的同學有十幾位都不在名冊上，偵察科是放在另一份名冊中，所以很多人都不清楚我們到底是不是官校十四期的畢業生。

返國後，我被派往第八大隊轟炸總隊三十



美基地宿舍寢室門口留影

五中隊服務，此地空地勤人員大約有一百多人。我沒到隊前，八大隊一共也只有兩架B-29俄國轟炸機。到隊後，機場上基本上是沒有飛機。陳漢章（三期）為總隊長，他將總隊長的印章交給我保管處理，參謀主任是一位六期的少校（名字忘了），他需要用到印章時就必須向我拿，由我蓋章，對我十分的信任。

第八大隊為士官大隊（飛行員全為飛行士校一、二期畢業生）都是擔任副駕駛的職務，分隊長以上的幹部都是官校十期以上的畢業生，此刻正由總隊長帶領他們前往印度後坐船到美國，接受B-29重轟炸機訓練，因為隊上沒有飛機，所以我在隊上主要的工作，就只能教他們學習英文方面的課程。在八大隊待了有半年之久才離隊。八大隊到抗戰勝利為止，在這兩、三年的時間，都是有番號有隊員而沒有飛機的一個作戰單位，直到抗戰勝利後，移防上海大場機場才有B-29重轟炸機的進駐。

美國陸軍第十四航空隊「中美空軍混合團

一成立，航空委員會決定派我們一些英文方面比較好的同事前往支援。一位是周伯通少校（六期原驅逐科後任翻譯官）及班潤寶中尉（也是第三批留美十三期同學，但英文講得不太流利）及我三人，我們前往駐成都鳳凰山的十四航空隊報到。我們去報到時鳳凰山才被一架日本飛機掃射過，機場上處處破亂不堪，機場上也沒飛機進駐，我們到此主要的工作就是成立十四航空隊總部的前期派遣工作，工作了兩個星期，才完成計畫的紙上作業。總部還未正式成立，就接到命令轉派至新津機場美國陸軍第二十航空隊

總部，擔任聯絡官之職務。

美國陸軍第二十航空隊為B-29重轟炸機大隊，於民國三十三（一九四四）年四月四日成立，該航空隊裝備著盟軍反攻要角的B-29超級空中堡壘式重型轟炸機，並希望利用四川的空軍基地來轟炸日本本土。為了配合美軍，我國政府在四川與廣西號召農民建立了數個可供B-29起降的跑道。其中廣漢和新津是最大的兩個機場。

我們派到此處後，美方對我們也確實有些防範，美國來中國的軍人多，左右的鄰居都是美國的飛官，他們的寢室一間是睡六個人。我們三人住在一間，有三張床，和一張辦公桌，是寢室也是聯絡官室，周伯通那張床放在辦公桌旁邊，我的床和班潤寶放在一起，我與班潤寶非常要好，如親兄弟一般，但因他們兩人的個性和脾氣關係，和美國人相處的情形很差，如此一來，等於被美國人冷藏起來，並未交付任何工作，航空隊也不放人走。我們在此所知的一切，都是美方從印度寄來的美軍CBI（China Burma India）中緬印報紙，從中瞭解到歐洲世界各戰場上的消息，閱報已成為我在隊上最大的消遣了。

四月二十四日，第一架B-29降落於四川廣漢基地，到了五月十日，廣漢基地已集結了上百架B-29，美軍第十四航空隊在基地周圍配備了六個P-47雷霆式戰鬥機中隊來保衛基地免受日機的空襲。

六月十五日，B-29轟炸機首次轟炸日本八幡，引起了日軍上下一片震驚，隨後B-29轟炸機又轟炸了日本北九州與偽滿鞍山鋼鐵廠……。

美國人也只對我一人表示友好及信任，此時隊上成立了「救生中隊」（Search Rescuer



於救生中隊時的中尉軍官

Party)，那時指揮官李梅將軍還未到任，有一位美軍Don Kan中校負責二十航空隊醫務的總隊長找上了我，要我參加他們的「救生中隊」。

整個二十航空隊於駐防中國期間，總共摔了四十二架的飛機。二十航空隊是一個有好幾萬人，很大的美軍單位，而我們的「救生中隊」這個特別小組一共只有五個人，我及四個美國人。隊長是Don Kan中校，在美國曾任某醫院的院長，我（中尉）自幼也學了一些醫療診治知識，另外加上三名醫護士兵所組成，每個成員都具備護理的背景。

美隊長自己有間房子很漂亮，又有傭人，也常請我們到他家吃飯，二十航空隊駐華的一年多期間，我一共出了一百一十六次的救援任務，可以說是天天都在救人，接到了命令，就由我帶領他們出動去救人，救援的對象都是二十航空隊的成員。

每當收到求救電訊的時候，「救生中隊」就必須奮不顧身前往災難現場，因墜機或迫降地點皆為無人煙的山區，救援困難，其現場也

是非常的恐怖，也常見山頭樹叢中分散的空勤人員的遺體，等待救援的受難者見到我們，時常眼泛著淚光，感激萬分地等著我們的到來，「救生中隊」以緊急救援為宗旨，也以搶救生命為惟一信念。

美國人對我們「救生中隊」的福利也特別好，我每個月發的煙票配給，可以買十條香煙，我們買一條香煙八毛美金，除了自己用之外，其餘的拿去給自己的中國同事使用，那時一條美國香煙賣價就等於一個中國飛行員的薪水。除了有中國方面的薪水可拿之外，我們一天還有二十美元的津貼，美國的中尉飛行員薪俸才四百多至五百元，我那時真的很有錢，但同住的另外兩人就沒有任何配給及津貼了。

召開參謀會議，B-29重轟炸機每次出擊前任務提示時，我和隊長兩人就必須一同參加，瞭解飛機進出地點。

那時何應欽將軍打電話給第三路司令部王叔銘將軍和參謀長賴銘湯將軍（賴銘湯將軍很喜歡我，他任參謀副總長時我調到國防部任職），他們也想要知道美軍的轟炸計畫。王叔銘將軍來電告知二十航空隊的所有事情，也只有我一人最清楚了，但我不能向何應欽將軍洩露任何美軍的情報，我發過誓在美軍單位服務期間，不得向任何人及單位提供任何資料。那時在基地附近太多的間諜，有中方、日軍、共軍及偽軍的間諜想辦法要瞭解美軍的動向。美國在四川有八個機場給B-29使用，尤其在新津機場，戒備最為森嚴。有時半夜可聽到日本的飛機引擎聲，也曾看到了漢奸對天打出紅色的信號彈指示方向，但我們機場從未被日機轟炸過。

我知道李梅將軍要轟炸臺灣岡山機場的任務，此屬最高機密，行動前知道的沒有幾人，

我自然更不能講。二十航空隊的任務也很多，他們出動去轟炸日本本土，炸上海、炸瀋陽兵工廠……等處，來回沿路上都有高射砲在打他們，我們的救援小組必須要知道，當他們飛機受傷或故障，被迫跳傘或迫降時所行經之路線，以方便救援行動。

我們這個小組人雖少但裝備很全，除了有四輛吉普車和兩輛中型之外，還有一架「U」型無武裝的小型聯絡機一架，可搭乘三人至五人，此飛機我就經常飛。我們得到了失事現場的資料後，近處就開車前往，遠處就飛小飛機後再轉車，飛機如墜在深山叢林處無路可達，就以跳傘和步行方式前往救援。我跳傘就跳了四次，每次的任務非常的辛苦也是很危險的。看到B-29失事現場等待救援的飛行員腳腫得鞋子都爆開了，真是可憐。

記憶中，在民國三十三年的年底，有一次救援行動，我們到了四川和青海省交界處的一個縣（名字已記不清了），得到了消息有架B-29失事，上面一共有二十三人。我和美中校領隊帶著一名隊員及一名飛行員，搭乘「U」聯絡機，於第二天趕到現場，在空中看飛機撞在半山腰上，無路可上去。我們三個人帶著救護裝備跳傘下去，整架飛機全毀了，場面是非常可怕及恐怖的，可見肢體掛在樹上，真是慘絕人寰，到處搜尋後其中十四人已殉職了，其餘的人在撞機時彈到機外得以存活，其中有三人還可以行動，輕重傷的有五人。聯絡了當地的縣政府派了民工爬上山將死亡者就地掩埋，傷者坐在滑桿上面，輪流擡下山，一路上真是很辛苦，下山後倖存者再與我們一起坐大卡車送回基地，因都還在四川地區不遠，前後花了四、五天的時間。

另一次，那架飛機是在黃河鐵橋上空被打



獲得頒贈美橡友勳章，背面刻有我英文名Chen Liu-Ting 4 Jan 1946。

傷了，最後也是墜地撞得很慘，那架飛機上也是二十幾個人。墜機的地方離基地太遠了，「L」聯絡機飛不了這麼遠，我們小組人員只能從天津機場開吉普車經過了關中、陝西、到達鳳祥縣，足足開了一個星期，老百姓在當地的縣政府幫助之下早已加入救助行動，我們只將倖存者及傷者七、八人用車送回基地，回到基

地，傷者立即搭乘空運機送至印度，最後轉送回美國就醫。

那時B-29出任務也是機密，飛機摔了也是機密，只有我們的「救生中隊」全盤瞭解，雖然我們的人很少，但對整個大隊而言卻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回中國人住的寢室睡覺之外，我整天都和他們在一起。在這一年多的救援任務中，二十航空隊機組人員的素質很高，其隊上的傷亡情況也很高，我從未見到有人因隊友的陣亡而哭泣難過。一早成批成批的飛機飛離了基地，常三三兩兩的返回，有時返回的飛機還不到出去的一半。第二天，接到命令就又出發了，真是偉大及壯烈。有一次全體出動共一百一十六架，回來時數了數，剩下八十幾架。飛機摔在中國各地區都有，我們的「救生中隊」也只負責救助摔在四川附近的B-29飛機，四川境外出事的飛機，太遠了就不是我們所能負責的區域，其生死一切就聽天由命了。才半年的時間，基地內我住的寢室左右鄰居的美飛官全都陣亡或失蹤，兩邊的房子有好多間都無人居住。

我也見到了太多死人了，在精神上的壓力也很大，任務回來第一件事就是沖澡洗掉身上的塵土與異味，躺在床上休息，累得不想動，因為我知道不久又要出動另一次任務了。

因中、印間空運急迫，而飛機耗油量又大，故每機加滿油飛成都，卸油後，只留夠返航的油飛返印度，如此每卸兩次油才可出一次任務，非常辛苦。不久美軍登陸西太平洋馬里亞納群島成功，擴充其中塞班、隄年、關島的許

在北平與張忠懿小姐交往，一起出遊留影。



多機場。一九四五年一月起，不再使用在華各機場，第二航空隊駐印部隊即於一九四五年四月起陸續調往隄年島駐地。二十航空隊撤離中國時，他們將地面的一切軍用物資都留下轉交給我，尤其重要的是留下了很多通訊的裝備及資料，我又將此批物資交給王叔銘的空軍三路司令部處理，我則又回到了八大隊。

我們抗戰勝利後，美國陸軍第二十航空隊返回美國，我的隊長向美方申請頒贈一枚「橡友勳章」，以表揚我在二十航空隊服務期間救助美軍之功勞。誰知我的隊長Dougan幫我申請後沒多久就去世了，他太太打電話給我，要我去參加他丈夫的葬禮，但國內有太多工作要做，我無法前往，她就將此勳章寄到上海給我。痛失了老戰友使我難過萬分，每次看到了一「橡友勳章」就想到了我們當年之友情，中國方面大概就我一獲贈此獎章了。

抗戰勝利後，八大隊派往上海大場機場駐防。有次前往北平出差，也就在此時我在北平



影留念前出務中隊偵察十二於飛行衣穿

了多次的偵察任務，我坐在最前面任副駕駛及觀察員，同時也擔任領航的工作，在此偵察期間，我們隊上原有二十四人，國共內戰期間不幸陣亡了十六人，人員傷亡損失慘重。

隨政府撤退來臺以後，我還是在第十二偵察中隊，同B-25前往大陸內地做偵察工作，也就在此時，我是第一個發現共軍空軍基地內有飛彈設備。

那時我的太太在美軍俱樂部擔任會計主任，一個月能拿一千美元（三萬八千塊錢），而我才拿一仟多元臺幣，家中的一切開支都要靠太太的薪水才能支付得了。

我太太認為這份工作實在太危險了，因此我打報告調到空軍總部情報署上班擔任作戰參謀工作，那時陳漢章為情報署署長，以後交接給衣復恩將軍為署長，才成立了「黑貓」高空偵察機中隊及「黑蝙蝠」低空偵察機中隊，在此期間，空軍死傷最慘重的就屬我們偵察機中隊了。

衣復恩將軍（五期）為署長時，就將我調派至國防部上班，孔令晟曾任蔣經國的侍衛長及建設局局長。當時從空軍總部調至國防部參謀次長室工作，派我到作戰第七處，此單位專門管反攻作戰，當時有作戰、後勤、人事、情報……等七個單位，所以又稱之為七個小國防部，處長為王光復上校（後因家庭的關係，十多年未能升任而退役），鄧文湘為副處長。

以後我們做反攻作戰，在國防部成立了一個「國光計畫」，陸海空三軍都有派人參加，參謀之中，陸軍有好幾個人，海軍有五個上校，空軍方面就我一人代表，一起開會，所做的

反攻計畫都屬於國家的最高機密，一定要守口如瓶，就連自己的同事也一個字都不能洩露。

在臺北縣三峽山區成立「國光作業室」由朱元琮中將擔任主任，動員三軍研擬三軍聯合反攻大陸作戰計畫。三峽山區原本是規劃為老總統避難之處，我們就住在那兒，樓上住了二十四個人，樓下就是作戰參謀室，一切計劃都在此處，印象最深的就是蛇多，手臂大小的蛇隨處可見，大概有上萬條蛇，隨時都可以打死十幾條蛇，走入山間都要戴斗笠，以防蛇掉到頭上，附近也養了鵝來防蛇。

每星期都要到國防部向老總統簡報一次，我的工作就是寫簽呈，送報告給每一位上將，老總統第一次看到我兩眼瞪得很大，不清楚我是何人，只對我說：「陳柳亭你的字寫得太難看了。」第二次報告就不同了，他已很清楚我的背景，也知道我是浙江天臺人，與他老家奉化、仙居都是在一起的，就對我非常的親切，當作自己人一樣，簡報時好多上將都很恭敬的站在那兒，卻叫我坐在他的旁邊。

最後在美國人出面持續施壓反對下，於民國六十一年（一九七二）七月二十日，國光作業室併入國防部作戰次長室，國光計畫正式終止，束之高閣，列為絕密檔案。

因長期工作壓力很大，使我的腸胃出了大問題，必須住院開刀，將胃拿掉了四分之三，十二指腸也拿掉了一部分，使得我元氣大傷。當時我任上校已做了六年，原本有一機緣可占少將缺，但身體太差了，不得不請求提早退伍，民國五十八年四月一日，就以上校軍階退役。

這就是我的一生，生於戰亂世代，現安祥於和平年代，只求子孫平安，往日種種一切只剩回憶了。

認識了我的太太張忠懿小姐，她是北平輔仁大學畢業，她的妹妹嫁給了我們十四期的同學方紹齡（他是我們班上第一個放軍飛的學生，後來也淘汰改飛偵察），在同學的介紹下認識，為了想進一步交往，所以打報告請調北平工作。我民國三十五年調至北平，交往一年後，三十六年我們倆結婚。

我被派往第十二偵察中隊。駐防北平期間，隊長是十五期的一個中尉，名字記不得了。我擔任上尉作戰參謀，之後隊長由戚榮春中尉（十六期）接任，隊上的飛行員也大多是中尉軍官，我一直等到共軍進城為止，這段時期我都在北平工作。北平撤守的時候，我們的B-25是最後一架飛機離開基地，B-25不是貨機，空間並不大，原飛機上載有數十箱金條，但救人要緊，只好將金條一箱箱往機外摔，散了一地都是，還是太重了，飛機差一點就無法離地起飛。

民國三十七年，十二偵察中隊移駐南京，在十二偵察中隊期間，我跟隨B-25轟炸機出